

谁道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

——王水照先生访谈录

吴河清

一 负笈北大,书山学海苦求索

吴河清:王先生您好!我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特邀请您做一次学术访谈,希望您能较为系统的谈谈您的学术研究历程。我们就先从您的求学经历开始吧。

王水照:好的。我13岁从浙江余姚西部的一座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隽“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它深深地烙入我少时的脑际。后来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说起来,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直接联系,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理学,黄宗羲乃《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幼时的我已能背诵。当时的浙江余姚县立中学,在浙东地区很有名,老师水平很高。语文老师是余姚日报的编辑,常借副刊给作文好的学生发表文章,我最初的文章作为铅字发表,就是老师提供的机会。乡下孩子都偏重文史,能在日报副刊发表文章感到很兴奋。但我走上研究宋代文学之路,并非源自“故乡情结”,却是另有原由。然而在余姚县中时代,的确培养起我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吴河清:请您谈谈当年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情况,据说那时的竞争是很激烈的。

王水照:我51年到上海读初三,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考场在复旦大学第二教学楼。当时我家在虹口公园附近,乘电车到复旦只需3分钱,但我是步行往返去考试的。关于那年报考北大中文系的一些情况,是文革后季镇淮先生因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来上海开会时告诉我的。当时上海地区第一志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有1200多人,共录取了10人,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学者张少康、陈丹晨、孙绍曾等人。季先生说那年来沪录取新生,眼睛都挑花了,真是优中选优。我入北大的学号是550607,学号代表录取顺序,这个印象很深。到了北大之后,我的学术经历才真正开始。巧合的是,1978年调到复旦后我第一次上课的教室,恰巧就是当年我参加高考的第二教学楼的那个教室。(笑)我一生的经历有三个点:1、北大求学。2、进入社科院哲学社科部文学所。3、1978年调入复旦大学。在北京23年(求学5年,在社科院18年);1978年我到复旦,如果65岁退休,恰好又是23年。因此可以说复旦是我求学经历的起点,又是学术工作的终点。

吴河清:请您谈谈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北大的学术背景给了您哪些重要的影响?

王水照:我进入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正是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50年代初的高

校院系调整是中国教育史上颇有争议的事件,但是全国有两所高校得益于院系调整也是事实,这就是北大和复旦。建国以后,国家确立在东南方建立一所与北大并立的名校,这个学校就是复旦大学。复旦中文系十大著名教授中的陈望道、刘大杰、王欣夫、赵景深、张世禄、蒋天枢、吴文祺、郭绍虞等都是从外校调来的,对于复旦教学力量提升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带来很大益处。

在院系调整之前,北大中文系知名教授也不算多,院系调整后,一下调进了8个在外校当过系主任的知名教授。我和同窗学友共同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到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采的校外专家的专题选修课,比如王季思先生的“戏曲研究”,郑奠先生的“《文心雕龙》研究”和蔡仪先生的“美学讲座”等;北大图书馆拥有的骄人典藏和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使我庆幸自己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度过了两年名副其实的苦读生活。然而,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打断了这个进程,在左批右批声中我一时颇感迷茫。幸而嗣后的“教育大革命”和“学术大批判”,却意外地把我引向了宋代文学研究之路。

吴河清:据说北大有两个“55级”之说,现在有一些老先生已经写了回忆文章,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王水照:北大中文系的两个“55级”之说,一是指毕业生,一是指入学生。55级毕业的有傅璇琮、沈玉成、金开诚、刘世德、裴斐等先生,后来都在学术上很有成就;我们55级入学的有张少康、谢冕、孙绍曾、鲁国尧、费正刚等同学,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也有一批人。这个集体主要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为各地应届毕业生,都是各地的尖子,当过团支书、学习委员的很多;二为调干生,比如谢冕等,在入学前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比较成熟,这两部分是很好的互补。

吴河清:您是北大中文系55级红皮文学史事件的亲历者,请您谈谈这个曾经造成轰动效应的事件的始末可以吗?

王水照:事情的起因有些偶然:一位受到“大批判”的老教授(学者诗人林庚先生)发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一下子刺激了我们全班七十多位同学的“革命积极性”,于是倡议自己动手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把红旗插上中文文学史的阵地”。这就是震动当年的所谓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红皮”《中国文学史》。第一阶段是三卷本红皮书,是大跃进的产物,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七十万字仅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

吴河清:这段经历对于您一定是难忘的,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这部文学史的学术意义?

王水照:“红皮”文学史出版后,给北大带来了很多的荣誉。其中有三个主要的观点:1、一部中国文学史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2、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3、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些观点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几次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主要是针对北大的这部“红皮”文学史,帮助学生们认识其中的错误和不足,这几次讨论会我都参与旁听。记得最后一天是1959年6月17日,由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作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又在《文学遗产》上分三期发表。何先生的发言重点是:文学史有规律可循,但是寻找这个规律是十分艰难的。他又告诫我们“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这是针对“红皮”文学史指导思想之一“民

间文学是士大夫文学的主流”而发的。他的发言说,民间文学是士大夫文学的丰富资源,给士大夫文学以滋养,但它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主流依然是士大夫文学。民间文学的“资源”作用,不能无限扩大为“主流”,真理与谬误往往就是一步之差。这给我印象很深。

在五十年代后期对学术批判进行反思之后,“红皮”文学史的三个观点被认为基本不符合事实。后来改写的“黄皮”四卷本,回到了较为正常的学术轨道,1959年出版。后来游国恩等五教授的文学史出版,加上了费正纲(我的同班同学)。有人说费正纲是作为北大“黄皮”四卷本文学史成果的代表参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皮”四卷本文学史还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吴河清:请问您在北大文学史的编写中担任哪一部分工作?这段经历给您带来哪些影响呢?

王水照:开始班上动员学生报名,当时我们的文学史课程才上到唐代,宋元组报名较少,我就报了宋元一段,并被指定为这一段的负责人。

吴河清:您执笔的北大文学史宋元部分,可否视为您后来成为宋代文学研究专家的起点?

王水照:作为一个大的方向,红皮文学史是错误的,黄皮文学史回归了正确的方向,但总的来讲学术贡献不大,但并非毫无意义。尤其对于参加的个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是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来回顾这段历史。一是我得到了继续攻读的机会,大家都下乡劳动了,而我们参编文学史的同学还在继续大量读书。二是得到了初步严格的学术训练,从搜集材料到思考、动笔写作,这些都锻炼了我的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由此我开始比较系统的阅读宋代文学的文献资料,也从此与宋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到文学所后,研究的领域是偏重宋代文学研究,又参加文学史唐宋段写作。北大时期编写红皮本、黄皮本文学史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一是搞学术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以论代史。后来文革中有人提出“儒法斗争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主线”的观点,我立即本能地表示质疑。二是复杂的历史现象,不能强行纳入特定的历史思路,这两条使我终生受用。比如现在宋代文学的一些宏观性问题,应尽可能从史料中引出结论。学术研究还是要学术敏感和预期成果,但必须从材料事实出发,引出正确结论。北大“红皮”文学史每一节都有学术史批判,比如对李白研究中资产阶级观念的批判等等。“红皮”文学史的编写确实有很强的火药味,“大批判”的色彩十分明显,我们的同学还写了长篇批判文章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整版发表,这种批判对老师造成很大伤害,应该记取教训。林庚先生大雅含宏,后来还是原谅了学生。他在为我们年级毕业三十周年所题的诗句说:“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读出来老师们并没有责怪我们,他说那段岁月是“无言之美”,所谓“无言”,当然有其说不出的滋味。但是经过风风雨雨磨练而能够保存的一些真情实意,连同青春期的幼稚、冲动,也算得上是一种美的记忆罢。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55级学生的确应该为那段岁月反思,当时有个别举动甚至超出了基本道德底线,暴露出人性的阴暗面。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就被教育“天地君亲师”,我对老师怀有自然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从来不写文章批评我自己的授业老师,一生如此。另一方面来说呢,我觉得“红皮”文学史与“黄皮”文学史应当有所区分。在编写“黄皮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同学和老师之间不再是“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而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二 踵武前贤 治学之道得真传

吴河清:您从北大毕业进入社科院文学所,正式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王水照:1960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一到所,立即投入组里正在进行的另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我因在大学时期的上述经历,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从此把自己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确定下来。我在文学所工作18年,当时的文学所是真正的名家荟萃之地。所长何其芳先生强调研究工作中的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然属于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所里为每位初来的年轻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以他并世罕见其匹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与丰富,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那个时代科研的特点是搞集体项目。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个集体项目中所承担的编撰任务,并结合编撰工作,或别有所得,或利用占有资料之便,独自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关于杜甫诗、柳永词的论文和《宋代散文选注》的编选,都是其时的“副产品”。

吴河清:我在跟您读书时,听您提到进入社科院文学所后,一大批著名学者成了您的同事,请您回顾一下对您影响最大的前辈学者。

王水照:60年代的文学所汇聚了一大批学者,余冠英、俞平伯、孙楷第等都是顶尖学者。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先生,一为钱钟书先生,一为何其芳先生。

吴河清: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编写文学史的工作过程中,何其芳先生的作用是如何体现的?

王水照:在编写文学史时,何其芳先生是未有主编名义的主编。他的宽容厚道是有口皆碑的,但对年轻人文章的评改却是严格甚至严厉的。我来文学所之初,参加古代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这是全所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其芳先生从指导思想、全书体例到组织安排等进行全面领导。当时规定,书里的重点章节由编写组全体会议评审通过,实际上主要是听取他的评审意见。分给我两个章节编写,一是韩柳、一是苏轼。这两部分稿子前辈学者已经写过,但是被否定掉了,这样的情况让我很为难。开始韩柳的稿子我不敢多动,只是把文字修饰一下就交上去,没想到立即就被否定了。那次会议上,他明确地说:这一章我不满意。具体意见是,你写的与已有的韩柳研究相比,没有新面貌;和已经出版的文学史相较,面目雷同,应该有“一寸之长”;立论的角度陈旧;文章的结构松散。然后他说,要推倒重写。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批评,当然不好受。但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却热乎乎的,感受到他恨铁不成钢的灼人的热忱。

其芳先生平时平易近人,但批评起人来毫不客气,非常严格,对我的第一个工作影响非常大。文学所的人都是各个学校分配来的,何先生规定到了一年之后,如无成果就请走人,调往其它地方院校,但大家都心服口服。我们这一届来了七八个,一年之后剩了两个半,在这种压力下人必须出成果。后来苏轼的稿子我就完全抛开原有的重新写了。何其芳先生在学术上是有霸气的,但他总是严格坚守学术规范。我在编写组写出的头一个章

节就被他“否”了,他的批评不但没有使我因畏惧气馁而与他保持距离,反而使我更加渴望亲聆他的教诲。写第二个章节苏轼时,我先把写作提纲寄给他请他指点,他很快约我去他家面谈。他桌上放着各种苏诗版本,对我说,为了对我的提纲提意见,正在赶读苏诗,还没读完;最近恐无时间读完,只好先谈谈,以免影响写作进度。他要我务必看全集,然后多与同时代和前后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他说,他不大爱读苏诗,其中不少诗并不是有了创作冲动以后写的。对古代作家的复杂性要充分估计,既看优点,也要看缺点,能把缺点及其原因说清楚也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我把文章写出来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听取他的评审意见。在那次会议上,他对其他同志写的章节提了详细的意见,最后简单地说:苏轼一章还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从他那柔和的目光中,我第一次领受到了他的鼓励和赞许。

把稿子取回后,我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做了改动。我原稿上说,“苏轼的诗、词和散文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改成“在北宋文学中都是成就很高的”。这个唯一的改动我想不通。那时我年轻逞性,心浮气躁,就擅自又改了回来。过了许久,他审看这部书的校样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最高成就”一处问我:这个地方我好像替你改动过?我只好支支吾吾地承认了。他的“认真”是早出名的,但从这部70多万字的著作中不放过一句话,这样的“认真”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他要我谈谈自己的观点。听了我的申述后,他沉吟一下说:你讲的也有一些道理,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保留。但这是部集体著作,力求准确、稳妥。比如论散文成就,苏轼与欧阳修恐怕不宜强分高下。还是说“成就很高”吧,你觉得怎样?他没有批评我私自“篡改”,反而耐心的听取一个文学晚辈的意见,互相平等讨论,这不是学术民主的主动示范吗?

吴河清:何其芳先生很有学术眼光,非常了解学术研究现状,听说他在文学所威望很高啊。

王水照:是的。他在文学所内威信很高,去世时大家的悲痛很真诚。后来有人在文学所批何,引起了公愤,问题是当时不许何先生公开答辩,不给他话语权。何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教我作文之道,如何取舍材料、写作、斟酌,是我人生的一笔珍贵财富。

吴河清:记得当年您曾充满感情的回忆起和钱先生请益交往的一些经典片段。您还愿意谈谈钱先生对您的影响以及您和钱先生交往的一些情况吗?

王水照:从1960年到197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又具体分在唐宋段,受到钱先生亲切的指导。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的两项集体工作中,更是多次获得耳提面命的机会。编写《唐诗选》时,有个“疑难杂症”的“会诊”会,由我先把大家在注释中遇到的一些难点,整理印发,大约每两周讨论一次。这时钱先生谈锋机辩,纵横无碍。也在这个时期,我在他的干面胡同寓所有过多次长谈。他喜欢在房间里边走边高声谈话,有时为自己的善譬妙喻爽朗大笑;有时逼近我的面前,提个问题考考,如果我偶尔能答上一两句,他就不无揶揄地夸说几句;有时取出他的读书笔记本说上一番。他的读书笔记本也与众不同,满页密密麻麻,不留天地,一无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处。每次谈话,总是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不能不告辞的时候。这些讨论和谈话,我在当时都有记录或事后的追记,我还查核过他在谈话中提及的典籍,可惜在浩劫中被我自己销毁了,具体内容尚待追索。但可以说,从他的这些日常谈话中,我才稍稍窥探到中国学术文化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领悟到一些真切的艺术底蕴。

那时文学所的年轻同志中,流传有这样一句话:何其芳先生的理论素养+钱先生的丰

富知识 = 治学的最高目标。现在思量起来,这话对两位先生都是一种误解,对钱先生的误解是双重的。他博览群书,却又看“透”资料,绝不迷信书籍。他实现了以我为主对材料的真正占有。更重要的,钱先生不屑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去建构庞大的理论“体系”,但他通过对具体文学事实的“鉴赏和评判”,已经多方面地揭示出实实在在的、牢确不移的艺术规律,理在事中,体大精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比如他认为各种有价值的文学流派,“完全可以同时并存,和平竞赛”。这些话是在 1980 年秋天说的。他的文学思考是与我们时代同步的,甚至是超前的。(笑)

吴河清:当年您曾多次给我们讲过,钱先生的《宋诗选注》是学者非常个性化的选本,后人无法模仿,还专门讲过《宋诗选注》可以有四种读法。

王水照: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它虽然属于普及性读本,选了 81 位作家 380 首诗,但又是一部独具特识、别有学术风采的诗学专著。在那时条件下,文学所要求面向工农兵普及的任务落到了钱先生的身上。他是用搏狮子的力量来搏小兔子,他的满腹才气情怀总是忍不住要冒出来,谁也无法模仿。他对材料的熟悉、诗歌的见解无人可比。他把普及的选注本作成了一个学术品位很高的精品。

我很愿意谈谈我个人阅读此书的四种“读法”:

第一,从宋代诗歌演变史的角度读“评”。此书 80 篇作家评论,篇篇都有新意,字字有分量。我曾使用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一口气专读评论,不啻是一部宋诗发展史的纲要,处处表现出钱先生对宋诗宏观把握的独特见解。这 80 篇评论还包含一些宋诗重大问题的专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等条论用典问题,刘子翬条论道学和诗歌的微妙关系等,都为宋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观察点。对各个诗人特点的分析也是其重要内容,如论苏轼诗的“博喻”、论范成大田园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三个系统的结合,都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赏和称引。

第二,从比较鉴赏学的角度读“注”。钱先生的注释,打破了传统选本着重于词语训诂、名物阐释、章句串讲的框架,而是把注释、评判结合起来。他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比较的项目有题材、境界、风格、意向、句式、用语等。比较的类型有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而涉及的学科有政治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逻辑学、方言学等,正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展开以鉴赏评判为目的的多种比较,使此书在诗歌鉴赏学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角度。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这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式的鉴赏。它的最大特点是,使传统的直觉体验和主观感悟式的鉴赏,上升到理性的艺术规律性的认识。

第三,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修改”。钱先生此书已经重印六次,每次都有增订,因此有个特殊的“版本”问题。我自己有个习惯,读他的著作,总喜欢用“对读”的方法:研究和体会他的改笔。例如郑文宝《柳枝词》“载将离恨过江南”一句,初版引证了苏轼等六个相似的用例,但再版时全部删去,改用周邦彦等四例:周邦彦例是把郑诗改写为词,说明其影响之广;石孝友词把船变为马,王实甫戏曲把船变为车,这从运输工具一面着眼。陆娟诗却把愁、恨变为“春色”,这又从所载之物一面着眼。原来苏轼等六个用例,也是经过精挑细选,得来不易的,但他们沿袭多,创新少;修改后更能看出一个艺术意象嬗递演化的轨迹,把作家们的创作构思抉剔入微。

第四,从贯通互参的角度读全书。由于体例的限制或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此书的有些部分,如能跟钱先生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合读,可以加深理解。《谈艺录》、《管锥编》中

对宋词的直接论述尤其应该辑录、对读。例如《宋诗选注》中对江西诗派以至宋诗的用典之风都持严峻的批评态度,就可参看《管锥编》第四册“《诗品》之特识”条。该条称赞钟嵘对用典之病的批评,并戏称为“钟嵘症”,如果再读《谈艺录》中举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的20多例,论黄庭坚“钩章摘句”条,论陆游的“蹈袭之病”等,对钱先生的严峻态度就能豁然开朗。

吴河清:钱钟书先生已经去世十二年了,但是他的学术思想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近年来,您对钱先生学术思想的研究又出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成果。您在2006年第2期《文学遗产》发表《〈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可以视为这些成果的代表吧。

王水照: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曾经因为不选《正气歌》受到过“批判”,也引起过讨论。日本小川环树氏为其辩护而写的书评,认为此应有钱氏自己的标准,是个尚未解开的“谜”。《钱钟书手稿集》对此提供了答案,包蕴着丰富的诗学内涵,体现了他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钱氏随后赠小川氏《宋诗选注》一书,并亲笔改动大小九十余处,约三千多字,小川氏题名“钱氏手校增注本”而珍藏。这些“改笔”,有的为再版本所采入,而有润饰增删,有的未被吸收,有的改动了又恢复旧貌,等等,都清晰地留下钱先生学术思考的印迹,为研究《宋诗选注》提供了生动的新材料。我的学生聂安福还从《管锥编》170页未完成稿“全唐文卷”入手,探讨钱钟书先生关于唐代骈文的一些观点;慈波依据《钱钟书手稿集》中论《樊川诗集注》近五千字的内容,品藻杜诗兼及冯注,识力独到,了解研究钱先生关于唐代诗学的观点;季品锋从《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关于江湖诗派的论述入手,探讨了钱钟书先生有关江湖诗派的辑补考辨及南宋诗歌本体的研究方面的成就。

吴河清:一部为普及而作的《宋诗选注》,却包含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和极大的学术信息量,堪称“学院派”与“大众化”完美结合的范例。

王水照:我觉得这种普及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要把“学院派”与“大众化”对立起来,而应该结合起来。让真正的学者去做普及工作,才是最好的状况。前辈学者也十分注意这样的工作。比如说我最敬佩的余冠英先生,他就在学术研究与普及工作结合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很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几个选本,从《诗经选》到《汉魏六朝诗选》,都是在很认真的研究基础上做的。所以我记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老师讲到《诗经》某一篇时总要引到这段训诂余冠英怎么说。如果从著作本身的定位来说,《诗经选》是普及型的东西,但是它现在却能与以前学术殿堂里的精品、经典排列在一起,足见余冠英先生是下了功夫的。除了《诗经选》,他做的《诗经选译》更引领了一阵风潮。他能把《诗经》用白话翻译的那么好,“信、达、雅”结合的那么好,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坚实的文学研究作基础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自己也很注意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转化成为大众化与学术精品适当的结合,因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三 博学精思,开疆拓土天水朝

吴河清:1978年,您从北京调至复旦大学任教,您的研究方向是否也由此定位在宋代文学领域呢。

王水照:1978年3月我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其时我们国家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我一面教书育人,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这时的研究,

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保持鲜活的时代特点。这时的研究,又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告别,完全能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秉赋素质的长处与短处,合理地选择课题。我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此时的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我的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也有所加强。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苏轼研究。早在北大编写文学史时,我是修改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初次接触苏轼遗存的作品,就被他的那种文学艺术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在无限广阔、难测其深的“苏海”面前,我惊愕、折服。后来文学研究所编的文学史,其中《苏轼》一章也是我写的。由于通读了苏轼的全部诗词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似乎写得更充实、更细致一些。然而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重新进行苏轼研究已经到了1978年,我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针对“文革”中“评法批儒”运动时对苏轼“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这是第一篇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而为今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面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后来我感到,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调整,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发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已经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后人的巨大文化遗产却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的作用。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不能不放在对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探讨上。依据这种理解,我便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吴河清:学界对您的《苏轼选集》评价非常高,感觉您的这部著作,不管是结构层面还是知识量、准确性方面,都很有自己的特点,对于苏轼文本的解读很有帮助啊。曾有书评赞誉此书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这部书获得了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王水照: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三百多篇,分体编年,“注释”都是冲着难点、疑点去的,我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对了解苏轼作品有关材料,另立“附录”。我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编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普及是很有意义的。

吴河清:在您的《苏轼选集》出版之后,您对于苏轼的研究并未停下脚步,而是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了。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一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苏轼研究》(收文二十四篇)一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王水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积累,我又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于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这篇论文,对苏轼

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颇为精细的剖析,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并进而详细分析他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论答案和适合办法。从政治家的苏轼,到文学家的苏轼,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轼,我近二十年的学苏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我的研究亦与之同步。

吴河清:早在文革前您就发表了有关宋代散文风格的论文,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又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王水照:散文研究是我的第二个研究重点。相对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却处于颇为沉寂的状态,难点和盲点甚多。我在“文革”前曾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只能看做初涉这一领域的粗浅习作。1978年后,先后写了《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1984)、《苏轼散文的艺术美》(1985)、《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苏洵散文与〈战国策〉》(1988)、《论散文家王安石》(1988)、《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1990)等文,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华》(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我对中国散文的“杂文学”性质有了重新认识。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现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词、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理论批评资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和编辑(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词话丛编》等)。相对来说,“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因此,全面的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我近年来努力于《历代文话》的编纂,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部基础性的参考文献。

吴河清:前段时间媒体报道《历代文话》时,称它是“中华文史资料库的新创获”,请问您花费十余年的精力来编撰这套丛书的想法是什么?

王水照:我们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发展系统。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章论》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生活最重要的事情。”这句话讲得很实在。比如对于苏东坡来说,肯定写文章比他写诗歌更认真,更须充分发挥他的潜能。我自己在作散文研究的时候,苦于没有一套评价的语言。由文献阅读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汉语言文学里面是有一个“中国文章学”的体系存在的,现在却还没有开拓出来、没总结出来。要寻绎这个体系,就要占有丰富的材料,所以就有了编撰文章学资料汇编的想法。我们应该有新的文学观念,这是学科进步的标志。而当我们试图揭示中国文章中特有的审美性时,就要去搜罗爬剔历史上的各种论文之语,这就促使我开始关注最典型的文章学著作——文话。经过这十年来的努力,依靠不少朋友的帮助,也就编出这套六百多万字的《历代文话》了。

第二,对宋代散文的总体把握与对北宋各大家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我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视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或谓之“群体风格”;同时逐一巡视北宋六家各异的创作历程,探讨他们在“群体风格”基础上的个人风格,以确立他们各自的文学意义与历史地位,力图勾画出北宋散文演进的轨迹。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较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阳修向尹洙学习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阳修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但我对南宋散文的发展脉络尚未有明晰的把握,尚在继续努力中。

吴河清:请问《历代文话》的出版,能够为学界带来哪些学术生长点?

王水照:《历代文话》编完后,我强烈地感觉到了我们现在的学术史有“三个遮蔽”:

第一个“遮蔽”,就是对中国本土文学观念的遮蔽。我们现在都是使用西洋的文学观念,而忽视了中国自己的文学观念,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其实,“杂文学”是能体现中国文学特色的一个概念,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是拿着西方文学观念当筛子,把我们本土所具有的文学特点全筛掉。《历代文话》编出来了,我们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材料,把里面所包含的有“永恒性”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既尊重现代的文章观念,又充分考虑传统的文章学特质,提升出或者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观念,然后打破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的遮蔽。这里还应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应用性文字的艺术性、审美性问题。

第二个“遮蔽”,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学术史遮蔽了许多文学家批评的大家。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大家》,就是特别表彰这位被我们文学批评冷落了文学批评家的。这次我还要提到两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一个是《古文辞通义》作者王葆心,一个是著名教育家唐文治。他们的文学修养都很高,文章学理论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该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史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王葆心,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但是你去看看《古文辞通义》,那是写得真好啊。十册《历代文话》,他一人占了一册,可以说王葆心是文话发展史上的殿军人物,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第三个“遮蔽”,就是我们的流行观点遮蔽了《四库全书》的优点。对《四库全书》的评价,要“具体书籍,区别对待”。在编撰《历代文话》的时候,许多书我们都是先用四库本作为工作底本,然后再利用所谓的“善本”进行复校的。后来我发现,许多本子其实是《四库》本最好。我这里当然不是要为《四库全书》翻什么案,而是说《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在未涉及到民族问题、国家问题的时候,它选用的本子一般是当时最精善的本子,特别是在“诗文评”这一类文献中。四库本不应该被一味地排斥。北京大学所编《全宋诗》,其中的“大家”,以《四库》为底本者,约达250家,以《四库》作为重要或者次要参校本者,也达203种之多。这都说明《四库》本中虽有删改漏略、草率从事等缺失,但绝非全无价值。我觉得《历代文话》的出版会给我们的学术界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一点,我是很乐观的。因为基础文献的整理,一定会推动专题研究的深入,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所以,我也对散文研究与中国文章学的研究前景充满期待。

我的研究重点第三个方面是宋词研究。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最早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宋词的,即《也谈姜夔的〈扬州慢〉》和《谈谈宋词和柳永词的批判地继承问题》。这是因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宋代文学标志性成果的宋词。但我对这个课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作了重点论析。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关于“豪放”“婉约”之争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区分两者的格套,而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指出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的思路,获得夏承焘词学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和趋向》,此文着眼于苏轼、秦观的题材相同或相近的诗词作品,进行多方面的详细对照、比勘,认为秦观诗虽有“词化”倾向,但基本上保持着词与诗的传统界限;而苏轼却“以诗为词”,但又“没有使词与诗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词之

所以为词的个性特征”。此文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秦观名词《千秋岁》及一组和词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祐党人对贬谪岭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种心态。其实,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应,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谪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力图以小见大,从一组九首和词的罕见文学现象中,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特殊意义,因而也为学术同道所重视。此外,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还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一书,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词学研究水平的论文,并撰写长篇序言,向国内词学界介绍日本词学研究的状况、方法和特点以及成就突出的词学家,以有助于国内词学的发展。

吴河清:宋词研究一直是很热门的研究领域,这与基础文献的整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吧。20世纪初的几位词学前辈,对于词学基础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水照:20世纪初的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等前辈,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这三位先生对于词学研究的贡献,实际上似有分工的。夏承焘先生主要是对词学的专题问题进行深入的揭示,特别是他的“年谱学”,非常成熟。他的每一篇有分量的词学论文,都是可以打开一个课题的。比如他关于宋词声调的发展过程,就一篇论文,实际上就已打开了一个纵深发展的课题。唐圭璋先生主要是词学文献的专家,他的两部大书《全宋词》与《词话丛编》,可以说是哺育了我们词学研究的后辈,后人要研究词学,这两部书是必备的。龙榆生先生办了一个《词学季刊》,每一期《词学季刊》上,他都有文章的,他的文章就是从宏观上提出问题,比如词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啊,词学应该包括哪些部门啊,词选的“标准论”啊等等。这可以看出榆生先生有非常强的建立独立的词学专科的思想,学科意识非常自觉,非常强烈。因而《词学季刊》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编的也活泼,信息量很大。

30、40年代以来,词学最发达,成果也比较多,新时期以来的词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呢,我觉得,凡事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说学科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一个难以为继的问题。宋词研究究竟要怎么进一步深入,现在进入了瓶颈期,面临着的一个大的突破的关头。我想词学研究也就是这个状况吧。2007年广州宋代文学会议,从论文集里面看出来,有些宋词研究者开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去研究宋词,这也是当前情况下的一种可行的选择。或者跳开宋词,走向金元词、明词、清词,也是不错的。总之,要在宋词里面做出大文章,现在可能很难了。

吴河清:您刚才说到词学研究成熟到了一定程度很难有突破性成果。您在2008年第2期《文学遗产》的《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是否可以视为寻找突破口的一种努力呢?

王水照:况周颐与王国维是清末民初两位最重要的词论家,《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分别被界定为终结过去和导示未来的词论著作。王氏“境界”说颇参新学,随着我国学术现代化进程而评价越来越高。对其论“境界”的九则词论,不免有“过度阐释”之嫌。而况氏的词论尚有广阔的开掘空间,其“重拙大”说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词学流派,姑名之为“金陵—临桂词派”。它与“境界”说是两种不同的对宋词的审美观照,代表不同的词学宗旨。这两种词学审美范式既有差别,又能互补,既有独特的历史贡献,又有客观存在的局限或失误。通过对于这两种不同审美范式的研究辨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学研究纵向发展的历程。

吴河清:您对于宋代文学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王水照:专题性的研究,是我前些年研究重点的第四个方面,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一项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祐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祐“学士”集团。它们都是以交往为联接纽带的文学群体,具有代代相承的特点。我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他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词文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又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殊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等,这项研究尚在进行之中。

《宋代文学通论》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由我和几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书由“绪论”、“问题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结束语”七部分组成,共50万字。我们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和体会。比如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来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嬗变等等,虽不敢自以为定论,却表示我对于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的努力,对于宋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

吴河清:近年来您在唐宋文学的文献整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您主持大型丛书《传世藏书》集库唐集工作,其中《全唐文》的点校订补极为艰巨繁重。

王水照:《全唐文》于嘉庆二十三年由两淮盐政司刊印,称为扬州官刻本。我们即以这个刻本作为底本加以新式标点。遇有原书中明显错误或重要异文时,则据《文苑英华》《唐文粹》《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及别集善本等予以校勘,做出校记,但均不改动正文,以求保存底本原貌。

我们工作的另一重点是增设附录部分。《全唐文》问世后,由于其卷帙浩繁,规模宏大,又兼成于众人之手,其遗佚漏收、正文讹夺、作者舛误之处,亦属难免。清代即有学者进行辑佚、纠谬、订补工作。陆心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补辑遗文达3000篇,作者近310人,是其中的重要成果。我特邀请对《全唐文》研究有年、《全唐文补编》的编者陈尚君教授从事对陆氏两书的订补,对其所收唐文,逐篇一一校理,并在陆氏原注出处以外,补充其他出处。如昭陵诸碑,原文残缺过甚,即据善拓或他书录文校补,有的文字补出一倍以上,才使原文完整可诵,实有起死回生之效。另外,劳格有《读全唐文札记》《札记续补》,岑仲勉有《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纠谬、正误、质疑共达400多条,陈尚君教授追继劳、岑两先生之后,撰有《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续有发明,我们一并收入附录。我们还做了总目编制,以便读者检索。

吴河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在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得见朝鲜活字本《王荆文公

诗李壁注》,将其影印带回国内,对于王安石的研究颇有助益。

王水照:这个本子保存了宋刻李注本的原貌,对研究王安石诗歌及宋代文学和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于施顾注苏诗,今存四部残本,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近年来努力的基础上,再加上我在日本搜集到的一些新资料,也可基本复原了,长期以来的缺憾,得以弥补。

吴河清: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带给高文先生您赠送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年逾八旬的高文先生根据书中的材料,写了一篇文章,考证出王安石《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的写作时间,比《宋史》的记载早了一年。这篇文章当年就发表在《文学遗产》上。高先生为了表达对您感谢,特作诗一首书赠:“坡公赤壁玉堂句,选注精明孰与双?欲致良知窥孟子,心香一炷奉姚江。”

王水照:这些前辈学者对我的嘉奖,我是铭记在心的。

吴河清:在2000年宋代文学学会成立时,您被大家推举为宋代学会会长,迄今已逾十年。请您谈谈十年来宋代文学的研究现状与走向好吗?

王水照:好的。宋代文学研究截至建国初期,与唐代文学研究水平是基本持平的,但是后来显然是落后了的。落后的原因我是这样看的,按照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我国文学的主要文体就是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类,而宋代文学处在一个由“雅”到“俗”的转变时期。就传统的文学样式来说——即就诗、词、文来说——由于人们通常认为诗歌到了宋代就爱说理了,而且说的多是理学家的一些道理,所以对宋诗总体评价不高;那么词呢,因为它的思想内容都偏重于儿女情长,反映的社会内容不够广泛,所以也得不到很高的评价;而散文本来就处在文学边缘的地位。这么一来,建国后至新时期初这段时间,学术界对整个宋代文学的评价就不高,也就无法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里面去。即使到了上世纪的80、90年代,宋代文学研究还存在许多空白。

近十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一直为学术界所瞩目。《全宋文》在2006年的整体推出,《全宋笔记》第二编的继续出版,与已出的《全宋诗》、《全宋词》可谓四维并举,使得宋代文学的文献资料库更显系统和完备。在研究队伍方面,中年学者更趋成熟,成果质量明显提高,尤其是一大批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和正在攻博的年轻学者,更充满一股新锐进取的活力,是我们这个领域继续保持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学会的各项工作也正常进行,两年一届的年会按期召开。今年九月,第七届宋代文学年会将在北宋都城开封召开。会议《论文集》和《宋代文学研究年鉴》按期出版。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中,宋代文学占有较大的比例,近期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也占优势,这说明在科研范围内宋代文学研究被人们看重和看好。

环顾现状,我们有理由感到高兴,虽然不能说宋代文学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已经“风景这边独好”,但不失为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面对我们的研究对象,长达300多年的宋代文学的方方面面,我们还有许多不足和缺憾。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格局,力求宋代文学的各个部类之间能够均衡有序地发展,起到互动互补的作用。宋代文学曾经存在的所谓“三重三轻”,即重北宋、轻南宋,重诗词、轻古文,重大作家、轻中小型作家的布局,近年来已有所改变,文体之间的不平衡现象有所调整,但仍有待进一步的加强。其实,对于南宋现存100卷以上别集的一大批作家,作为“前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个课题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注意到已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也有一些个案专著问

世,但还要注意形成规模,并从个案研究走向综合研究,以提升学术水平。若从整体格局来考量,还能发现宋代文学中一些长期被忽视或轻视的边缘性的文学,如相对于主流地位的汉民族文学,辽金少数民族文学尚在谋求新的开拓;相对于中心城市地区文学,边缘地区文学尚有待独立开发;相对于文人书面文学,宋代小说戏曲市民口传文学,几乎处于缺席的境地;相对于词、诗等“纯文学”,古文、骈文、赋等文体的遭遇,颇为冷落,近年虽有所改观,但对确切认识我国文学的民族特点而言,也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如何摆正主次的适当地位,并能发挥良好的互补互释作用,以共同展示宋代文学丰富多彩、璀璨夺目的历史原貌,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四 东风化雨 桃李不言满园春

吴河清:您 1978 年春调入复旦大学,成为高校教师时已年过不惑。学生对您的教学反映一直很好,您也曾获得过多次教学奖励,您的“中国古代教学体系的更新与完善”教改项目,曾经获得国家级教学奖。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王水照:我毕业离开高校十八年后才担任高校教师,对高校的教学情况不甚了解。1978 年 3 月 1 日到复旦报道,听了几节课,10 号就上课。第一次上课是给留学生讲中国文学通史,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备课辅导。有一个美国学生研究佛经,有许多问题需要逐字逐句讲解,备课花去许多时间。他们中有些人是带着研究的课题来中国留学,提的问题有时会很有难度。后来给本科生讲授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我得到了两点体会:一是教学要以科研作为支撑点,也就是说你的讲课内容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一般知识文学史教材都有,你自己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如果有一定的深度,就会在教学中更加吸引学生。二是我的讲课与教材是不即不离的关系,也就是详教材之所略,略教材之所详。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要融入自己特别的理解与感悟,这样会启发学生对此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我也很注意观察学生的课堂反应,从他们的惊讶、会意的笑声来了解并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有时还常去学生宿舍走访座谈,并注意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

吴河清:以科研带动教学的实例,在您的《半肖居笔记》中也有提到。

王水照:比如唐代诗人沈佺期各篇《独不见》之“独”。这首诗是一首典型的七律,明何景明等人曾推为唐人七律之冠。(见《升庵诗话》),然细按平仄,此诗为平起首句入韵式,全首平仄协调,确为七律典式。但只第七句“谁为含愁独不见”作“平仄平平仄仄仄”,以三仄结尾,“独”字似不谐。1980 年春,我曾因这两个“独”字向张世禄先生请教。他在复信中写道:“关于‘独’字,认为并无异读现象,沈、宋诗中用此字,有不尽合律之处,我想只能依据‘一、三、五不论’的例来解说。避忌‘孤平’之说,似乎尚待查究。窃意‘近体诗’的产生,是从‘古诗’的律化而来,而当‘近体诗’形成之际,便有反律化的‘古体诗’产生;同时‘近体诗’与‘古体诗’又发生交互的影响。”张先生关于“近体”、“古体”交互影响的论述甚为精辟,给我很大启示;但认为“独”字无“异读”,沈、宋诗“不尽合律”的意见,我仍有疑问。后来我读到温庭筠的十四首《菩萨蛮》(见《花间集》卷一),每首上下片的结句都为五言句,共二十八句,其中二十七句末三字都是“平仄平”(如“梳洗迟”、“金鹧鸪”、“残月天”、“头上风”等),只有“独倚门”一作作“仄仄平”。看来“独”字是以入作平的现象较为普遍,大抵因作者口音的关系(三人皆河南、山西人),反映出当时实际语言中

“入派三声”的演化倾向(“独”为全浊变阳平)。沈、宋此二诗应属平仄全合的律诗。

吴河清:您在教学中还多次讲到宋代散文大师欧阳修善于修改文章的事例。宋代笔记曾记载一个故事,欧阳修修改自己文章,“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他笑着回答说:‘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沈作喆《寓简》卷八)记得您曾经告诉我们,这个笑话包含着一条深刻的艺术经验:文章不厌千回改,名篇佳作离不开锤炼的功夫!

王水照:我有一篇小文谈到欧阳修修改文章的事例。《泂冈阡表》是他的名作之一,这篇墓碑文通过对亡父欧阳冠事迹的记叙,抒写作者的哀悼之情和褒扬先人之意。它是在初稿《先君墓表》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先君墓表》也收在他的文集中。将两文进行对照比较,修改的地方很多,处处表现出欧阳修在用字遣句、布局谋篇及突出题旨等方面的艺术匠心。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善用虚词。二是善用复笔。这两项都跟形成他的纤徐婉转、唱叹有情的独特艺术风格有着密切联系。

吴河清:您给本科生讲的北宋文人集团研究这门课,有一位来复旦进修的老师反映,他曾在北京、南京、上海的数所高校进修,但从未听到在两节课就传达了如此丰富的学术信息量的课,对学生的知识拓展与论文选题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最后一个问题,当前国内教育体系的成果评估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您愿意谈谈吗?

王水照:我的老师王瑶在政协会议上说过,此类问题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博士生必须发表两篇核心论文才能毕业,博士生发表论文可列入学校研究成果。现在的中国学术体系评价标准令人困惑,但是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我一直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每年都要面对这些问题。有些人搞学问不错,就是拿不到职称,有的人拿到了国家项目,就不准申请地方项目。

吴河清:记得二十年前,您在给复旦某届毕业生上最后一节课结束时,他们纷纷请您在纪念册题字赠言。您吟诵了苏轼的《浣溪沙》下阕与大家共勉:“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关于这几句词,您在书中注释是这样的:下片即景抒怀,西流的溪水启发作者,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保持热情,人生也能重返青春。岁月匆匆,您已过古稀之年,还在不断创造充满活力的成果。您培养的本科、硕士、博士生,也在全国各地的教育文化部门勤奋工作,我们都曾在您的指导下学习而感到荣幸。我想就用您非常喜欢的苏轼的这几句词,作为这篇访谈的题目吧。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本次采访的录音与文字整理工作,由河南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钱振宇同学协助完成,特此说明)

(作者通讯地址:吴河清 开封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1)

(责任编辑 晓 思)



王水照先生 浙江余姚人,1934年生。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顾问,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名誉会长。王先生长期从事唐宋文学研究,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宋代文人集团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代表作有:《唐宋文学论集》、《苏轼选集》、《苏轼论稿》、《苏轼研究》、《王水照先生自选集》、《宋代文学通论》等学术专著;整理编撰《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王安石诗李壁注》、《历代文话》等文献;编辑海外汉学研究丛书《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等;著有《半肖居笔记》、《鳞爪文辑》等学术随笔。《苏轼选集》获得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宋代文学通论》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苏轼论稿》1998年获全国普通高校第二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9年又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